

# 诗经

刘冬颖 选注

伐柯

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。

取妻如何？匪媒不得。

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

我觀之子，笄豆有珌。

中华传统诗词经典



中华书局

# 诗经

刘冬颖 评注

匪斧不克。

匪媒不得。

其则不远。

我粃之子，  
苴豆有践。

中华传统诗词经典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经/刘冬颖评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3. 10

(中华传统诗词经典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9678 - 1



Ⅱ. 刘… Ⅲ. ①古体诗 - 诗集 - 中国 - 春秋时代 ②《诗经》 - 评注 Ⅳ. I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32451 号

- 
- 书 名 诗 经  
评 注 者 刘冬颖  
丛 书 名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  
责任编辑 陈 虎  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 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 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  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
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 
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规 格 开本/787×1092 毫米 1/32  
印张 8¼ 插页 2 字数 90 千字  
印 数 1 - 10000 册  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9678 - 1  
定 价 25.00 元
-

## 出版说明

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,而诗词是人类心灵的形象展现,尤其是古典诗词,她所具有的深厚的韵味和音乐性的特点,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具魅力的表现形式之一。

时至今日,诗词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,拥有着广大的爱好者,人们心中那些幽微的情意仍要借诗词来传达。中华书局历来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,出版了许多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。近期,由中华书局发起,联合光明日报社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华诗词研究院、中华诗词学会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,共同举办了“诗词中国”传统诗词创作大赛文化公益活动,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,人们积极创作投稿,掀起了一场古典诗词创作的热潮。随着活动的展开,我们认为有必要为人们提供一套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诗词读本,以方便读者创作与欣赏。

朱光潜先生说:“学文学第一件要事是多玩索

名家作品,其次是自己多练习写作,如此才能亲自尝出甘苦,逐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,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。到了这步,文学的修养就大体算成功了。”这番话可谓是前辈大师的经验之谈,我们学习欣赏和写作古典诗词也应从“玩索名家作品”入手,有鉴于此,我们编选了这套“中华传统诗词经典”丛书,并作为参加“诗词中国”传统诗词创作大赛的学习参考书。

丛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:一、关于如何写诗赏诗的理论著作。包括《诗词格律》《诗词写作常识》《怎样赏诗》《怎样用韵》《人间词话》等;二、最具代表性和普及性的诗词总集。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词三百首》等;三、历代名家名作。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苏轼、辛弃疾、李清照、柳永、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。

具体到每一本书,我们的做法是:一、精选作家作品。入选的作家一般为诗词领域领一代风骚的人物,入选的作品以传诵程度为首要标准,且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;二、引导扩展阅读。作家的选集中附一到两篇评论文章,帮助读者多维度了解

相关作家作品；三、选用权威版本校勘整理。基本体例为正文、注释、评析三部分，各书根据内容的不同略有变化。为便于阅读，一般不出校记，注释力求准确简洁，评析旨在帮助读者领会诗词的意境及妙处。

丛书采用双色印刷，小32开本，只手可握；以便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徜徉于诗词的海洋，尽情享受诗词的华美情愫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二〇一三年八月

## 《诗经》的来历

高 亨

《诗经》共三百零五篇，简称“三百篇”，是我国第一部诗集、周代前段五百多年间的诗歌选录。它的来历据西汉人说，是古代帝王为了考察风俗的好坏、政治的得失，设有采诗的官，把采来的诗篇献给乐官大师，大师再献给天子。这种说法显然是有意为统治者吹嘘，因为先秦古书并没有记载过采诗的官和采诗的事，所以周代是否有这种制度，还不能定论。但汉人所说那时的诗篇最初都集中在乐官手里，却是事实，有两个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：第一，《诗三百》都是乐歌。所以《墨子》说“诵《诗三百》，弦《诗三百》，歌《诗三百》，舞《诗三百》”（《公孟》篇）。

乐歌原来是供统治阶级娱乐的东西，乐官正是掌管诗歌、音乐、舞蹈，给统治者服务的人，那么乐歌和乐官在当时是分不开的，编辑乐歌的人就应该是乐官了（乐官编辑之后，才转为统治阶级的教育课本）。第二，据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一年》记载：“吴公子札来聘，请观于周乐，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、《王》、《郑》、《齐》、《豳》、《秦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、《陈》、《邠》、《小雅》、《颂》。”所谓“周乐”，差不多包括了今本《诗经》全部（只有《曹风》、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不在内），这些诗是鲁国乐工所歌，而称作“周乐”，那么编辑者应该是周王朝的乐官了。

周王朝的乐官所以能够得到这些诗歌，大约有三个来源：第一，王朝的贵族为了充实音乐，为了祭祀鬼神，为了夸耀功业或别种目的，作成诗歌，交给乐官。《周颂》里应该有些诗篇是出于这种来源。第二，王朝乐官为了给贵族服务，尽到他的责任，留心收集流传在民间或出于士大夫



之手的诗歌（并不是专职的采访）。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及《王风》里应该有些诗篇是出于这个来源。第三，诸侯各有乐官，掌管本国的乐歌，诸侯为了尊重王朝，交换音乐，派人把乐歌献给王朝。《王风》外的十四国风及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里应该有些诗篇出于这个来源。《国语·鲁语》说“昔正考父校（校当读为效，献上之意）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……”便是例证。

通过上述的三个来源，周王朝乐官掌握了不少诗歌，并随时增加，随时编选，经过五百多年，乐官们才完成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。所以我们说，《诗经》是周王朝各时期的乐官所编辑。

到了春秋末期，孔子把《诗经》加以重订，作为他教育学生的课本。他说：“吾自卫返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篇）可见，《诗经》是经过孔子重订的。

《诗经》这部书，原来当有三百二十篇左右，不幸遭到秦始皇的焚烧，禁止学习，到西汉初年，还剩下三百零五篇。

西汉时期传《诗经》的有四家：鲁人申培所传的通称“鲁诗”，齐人轅固所传的通称“齐诗”，燕人韩婴所传的通称“韩诗”，鲁人毛亨所传的通称“毛诗”。鲁、齐、韩合成一个宗派，他们的传本，经文都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，所以叫“今文《诗》”。毛自成一个宗派，据说他的传本，经文原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，所以叫“古文《诗》”。四家经文小有不同，解说多有歧异，今文家和古文家歧异更甚。齐诗亡于曹魏，鲁诗亡于晋朝的东渡，韩诗亡于宋朝的南渡（只有《韩诗外传》尚存），现在《诗经》只有毛亨所传的一种本子了。

（选自《高亨著作集林》第3卷，  
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5—7页）

## 《诗经》：两千多年的学子课本

《诗经》从产生之日起，就是贵族子弟的教材。周代的诗歌教育，主要是结合礼、乐教育进行的。当时的习礼、习舞、习乐等活动，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。周代的学校，大概分国学和乡学两级。国学即天子之学，是当时的最高学府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为主要学习内容。其中“乐”，包括音乐、诗歌、舞蹈等内容。据《周礼》所载，大司乐向国子传授“乐德”、“乐语”、“乐舞”。其中“乐语”之教，包括“兴、道、讽、诵、言、语”，“讽”与“诵”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，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、创作诗歌。当时，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，应用范围也很

广泛，祭祀、宴饮等场合都要歌《诗》。《诗经》和礼、乐结合在一起，逐渐成为社会伦理纲常的一部分。《礼记·经解》云：“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。”唐代的孔颖达在《礼记正义》中解释“温柔敦厚”说：“温，谓颜色温润；柔，谓情性和柔。《诗》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，故云‘温柔敦厚’，是《诗》教也。”这是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，即运用“温柔敦厚”对社会进行礼义方面的规范。“温柔敦厚”作为儒家的《诗》学理论，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其文艺思想，也相应地以“发乎情，止乎礼”为上。

在中国有确切文字可考的历史中，最早有意识地以《诗》为教材的人是孔子，他把《诗》作为教学内容之一。孔子在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时就曾说过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“《诗》教”思想，提出“以意逆志”等诗学主张，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“以意逆志”就是说在读诗时，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，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

思想感情。孟子的弟子咸丘蒙曾问孟子：“《诗》云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而舜既为天子矣，敢问瞽瞍之非臣，如何？”孟子答道：“是诗也，非是之谓也。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。曰：‘此莫非王事，我独贤劳也。’故说《诗》者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。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）孟子的意思是说，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绝对真实的事件，《小雅·北山》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的意思是说诗人为王事尽力，别人做得少，自己做得多，因而不得奉养父母，主旨不在于“普天之下”云云，不要因为这句话而影响了对于诗人情志（孝道）的认识（不以辞害志）。此后，“以意逆志”一直是我国诗学理论的重要原则。荀子继承孔、孟《诗》说，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，把《诗》与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，发扬了儒家的“《诗》教”传统。荀子晚年曾在楚国兰陵传经，对《诗经》的流传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秦朝统一天下后，秦始皇采取了“书同文”、“禁私学”和“以吏为师”等巩固统一的重大政策和措施。“禁私学”、“以吏为师”，实际上是取消教育制度。既禁私学，又不设官学，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。再加上“有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者弃市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这样的文化专制政策，使得《诗经》的传播在秦朝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，这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历史性灾难。

在汉代，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，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，诗歌被视为“经夫妇、成孝敬、厚人伦、美教化、移风俗”（《毛诗·大序》）的工具。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“《诗》”奉为“经”，此后便称“《诗经》”。汉代人更是把它抬至“五经”之首，设立博士官。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，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。《诗经》既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，也是私学的选学教材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虽然政权长期处于分裂状

态，但在教育上同样以儒学为先。无论官学还是私学，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，《诗经》依旧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。由于统治者对诗歌的爱好和提倡，所以《诗经》常作为学童阅读的初级教材。

隋、唐时期的中央官学，已实行分科教学，分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毛诗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五个专业。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，先后令颜师古撰《五经定本》、孔颖达编纂《五经正义》，作为教材颁行天下。因是唐代“九经”之一，所以《诗经》是唐人非常熟悉的经典。宋代科考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变化，但经文始终是最重要的内容，《诗经》被确定为“十三经”之一。

明朝建立后，从京师到郡县直至农村地区，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体系，普及程度为唐、宋所不及。科举制度更受重视。学校教育中竭力推崇官方哲学思想——程朱理学，把《五经大全》、《四书大全》和《性理大全》作为钦定的学

校教科书。到了永乐年间，《四书大全》、《五经大全》便成了学校教学的主要课本。明中叶以后，科举腐败，官学衰落，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士大夫就纷纷创建书院。在整个《诗经》学史上，以伦理道德说《诗》占据了主流。而明代的《诗经》研究，却最见性情。尽管当时的正统教育，仍把《诗经》作为寓有圣人伦理纲常教义的圣典，然而在更多的凡夫俗子眼里，它已变成了一部表达古人情怀的“性情”之作。清朝的官学教育制度基本上沿袭了明制，学制基本相同，都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类。中央主要是国子监，地方有府、州、县学和书院，此外义学、社学、私塾等伴随着民间的搜书、藏书和编书的风行也愈来愈昌盛，《诗经》仍然是重要教材之一。

明、清的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钳制士人外，还用科举来诱导知识分子就范。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盛行的“八股取士”，就是典型代表。《诗经》与科举的距离进一步拉大，诗歌更多地成为文人吟风弄月或抒发情志的手段，但传统“《诗》教”



的作用仍得到人们重视。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楹联“身教莫如礼，言教莫如诗”，就说明了这一点。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“废止读经”，两千多年来，《诗经》一直是儒家的经典教材，历代研究《诗经》的文章汇集起来可谓汗牛充栋。可以说，《诗经》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，又经过了历史上无数精彩心灵的熔铸而变得更加丰富、博大。

闻一多说《诗经》是我们中华民族第一本文化的教科书，而且最早的时候是唯一的。诚然，《诗经》时代的很多东西已经属于过去，隔膜与误会总是难免，然而，触摸《诗经》，性情的温度还在，情感的湿度还在。我们不能把《诗经》当作一个远古语言化石，它像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古莲子一样，只要有适宜的阳光、温度和水，今天我们仍可以激活它，让它发芽、开花。无论“今夕何夕”，若你游走在《诗经》的层峦叠嶂间，总会发现文字背后似乎裹藏着熟悉又亲切的灵魂。《诗经》如一位素面朝天的，却国色天香，被历史宠